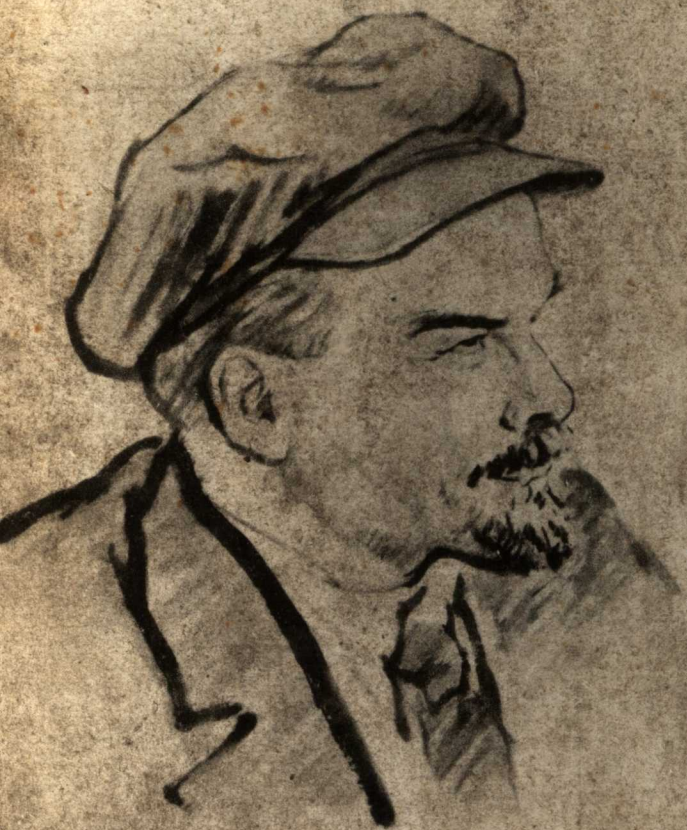




列宁

高尔基

封面題字 郭沫若

封面画像 蔣兆和

本書內的列寧画像均系蘇聯
畫家彼·瓦·瓦西里也夫所作。

列 寧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671 字數 19,000 開本 787×1092 耗 $\frac{1}{30}$ 印張 2 $\frac{10}{15}$ 插頁 5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價(3) 0.77 元



列宁、高尔基和克鲁普斯卡娅

統一書號： 10019·671

定 价： 0.77 元

10832/17

弗拉基米尔·列宁死了。

甚至他的敌人阵营里也有些人坦白地承認：列宁死后，世界上失掉了一个“在他同时代的一切伟大人物中間最有天才”的人物。

德国資產階級報紙《布拉格日报》，刊載了一篇有关列宁的文章，充滿着一种对于这个巨人崇敬的惊奇心情，文章結尾是这样：

“列宁就是在死后也是伟大、无比崇高和令人生畏的。”

从这篇文章的語調可以清楚地看到：写这篇东西的动机，并不是由于一种生理上的滿足，象“敌人的死尸嗅起来总是香的”这句玩世的格言所說的那样，也不是由于那种愉快，象人們在一个非常不安分的人离去的时候所感觉到的一样，——不，在这篇文章里，高声地响着人对人的一种夸耀。

俄国侨民報紙竟然既沒有魄力，也不知道分寸，对列宁

的死竟沒有表示一種敬意，就象一些資產階級報紙在評價這個生活意志和堅強理性的最大體現者的時候所表示的那樣。

描寫他的肖像是不難的。從表面上來說，聽到列寧的話就知道他整個的人，正如看見鱗就知道是魚一樣。他是樸素和率直的，就象他所說的話一樣。

他的英雄主義差不多完全沒有外表的光芒，他的英雄主義是一種在俄國常見的、堅信大地上能夠實現社會正義的正直的俄國革命知識分子的謙遜克己的獻身精神，是一種擯棄世界上的一切歡樂而為人類幸福從事艱苦工作的人們的英雄主義。

我在他死後不久所寫的關於他的文章，是在沉痛的心情下寫成的，既潦草，又不好。為了“有分寸”的原故，有一些話我當時不能寫出來，我希望這是大家完全了解的。列寧這個人具有鋒銳的眼力和偉大的智慧，然而“有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悲痛”。

他總是向前看得很遠，而且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考察、評論人們的時候，常常正確地預測到他們在幾年以後將成為怎樣的人。人們不是始終願意相信他的預見，他們常常很不

高兴，可是很遗憾，有不少的人却证实了他的怀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以前所写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除了不好以外，还写得前后不一贯，而且有一些令人懊恼的遗漏。我应当从伦敦代表大会^①那些日子写起，那时候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一些人怀疑和猜忌，同时被另一些人公开地敌视，甚至憎恨。

就是此刻，我还清楚地看见伦敦郊外那座简陋得可笑的木头修造的教堂的赤裸裸的墙壁，那类似穷学校的教室的小而狭窄的厅堂的箭形的窗户。这个建筑仅仅在外表上象一个教堂，它的内部却完全没有做礼拜用的东西，甚至传教士的矮矮的讲台也没有安置在厅堂上方的顶端，而是在进口的地方，在两道门之间。

这一年以前，我没有会见过列宁，也没有好好地多读他的著作。但是我读过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直接认识他的同志们热情的叙述，都以巨大的力量使我倾向于他。当有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锐利的眼睛审

① 指一九〇七年五月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译者注。

視着我，帶着老相識的語調玩笑似地說：

“您來了，這好極啦！您不是喜歡打架嗎？這裡將要大戰一場。”

我所預料的列寧並不是這樣。我覺得他缺少着什麼東西。他用喉音卷着“p”，把兩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總之，這整個人太樸實了，在他身上感覺不到有絲毫“領袖”的風度。我是一個文學工作者。這個職業逼着我注意瑣細的事情，這個職務已經變成習慣了，有時候這種習慣令人感到討厭。

當我被“引見”格·瓦·普列漢諾夫的時候，他雙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嚴厲地、有點厭煩地看着我，好象一個對於自己的職務感到厭倦的教師看着一個新學生一樣。他向我說了一句極其普通的應酬話：“我對您的才能是很敬仰的。”除此以外，他不曾說過一句令我難忘的話。在代表大會整個期間，不管是他，不管是我，都不想作“知心”的談話。

但是這個禿頭的、用喉音卷着“p”的、結實的、強壯的人，一隻手摸着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另一隻握着我的手，親切地閃亮着他的一雙靈活得驚人的眼睛，立刻就談到《母親》這本

書的缺點，原來他已經從伊·彼·拉迪日尼柯夫^①那里把手稿拿去讀過了。我說這本書是很匆忙地寫出來的，但是還沒有來得及說明為什麼匆忙，列寧就肯定地點點頭，自己把這個原因說明了，他說我趕寫得很好，這是一本必需的書，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覺地、自發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一讀《母親》，一定會得到很大的益處。

“一本非常及時的書。”這是他對我的唯一的然而極其珍貴的贊語。接着他鄭重其事地詢問我：《母親》是否譯成外國文，俄國和美國的檢查機關把這本書刪改了多少；等到他知道了作者在被通緝的時候，他首先皺着眉毛，接着把頭仰起，閉上眼睛，發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大笑；他的笑聲吸引了工人們，走过來的好象是福馬·烏拉爾斯基和其他兩三個人。

這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我處在三百個優秀黨員中間，知道他們是被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派來參加代表大會的，我親眼看見了黨的所有的領袖、老革命家普列漢諾夫、

^① 拉迪日尼柯夫(1874—1945)，布爾什維克，一九一七年革命前的一個出版社的領導人。——譯者注。

阿克雪里罗德^①、介奇^②。我的愉快的心情是完全自然的，而且如果我說在侨居国外的两年中我平常的情緒是大大地低落了的話，讀者是会了解的。

我的情緒的低落是从柏林开始的，在那里我差不多会见了社会民主党所有最重要的領袖，我在奥古斯特·倍倍尔^③家里吃过飯，坐在肥胖的辛格尔^④旁边，周围还有其他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們吃飯的地方是一所寬敞而又舒适的房屋，几个画眉鳥籠雅致地披着綉花的罩布，安乐椅靠背上也盖着綉花的罩布，以免坐在椅上的人用頸背弄髒了椅套。这里的一切东西

① 阿克雪里罗德(1850—1928)，曾参加劳动解放社，后来成为孟什維克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进行反苏活动。——譯者注。

② 介奇(1855—1943)，起初是民粹派，后来是社会民主党人，曾参加劳动解放社，一九〇三年后成为孟什維克，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退出政治活动。——譯者注。

③ 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創立者和領袖。——譯者注。

④ 辛格尔(1844—1911)，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領袖。——譯者注。

都是很結实的、牢固的，大家庄严地吃着飯，而且庄严地互相說道：

“馬尔采特①。”

这个字我不認識，但是我知道法文的“馬尔”就是俄文的“糟糕”，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时代”，这样一来，就是“糟糕的时代”。

辛格尔两次叫考茨基②作“我的浪漫主义者”。倍倍尔长着一个鷹鉤鼻子，我觉得他有些自滿。我們喝萊茵酒和啤酒，萊茵酒是酸的和溫暖的，啤酒是很好的；談到俄国的革命和社会民主党，他們也是酸溜溜的，帶着不以为然的态度，然而談到自己的德国的党——那就一切都好极啦！总之，一切都是很自滿的，好象那些椅子也滿足于自己身上承受着这些領袖們的尊貴的軀体似的。

① 德文“mahlzeit”的譯音，意思是，請吧。——譯者注。

② 考茨基(1854—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早年曾受馬克思与恩格斯的影响，一度成为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但由于他的机会主义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已趨向反动，大战时期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后来坚决反对苏維埃政权和共产主义运动。——譯者注。

我和德国党之間有过一件“微妙”的事情：它的一个重要
的党员，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巴尔烏斯^①，从知識社^②得到一
份委托書去各个剧院收集《在底层》的上演稅。他是在一九〇
二年秘密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在車站上得到这份委托書
的。他所收集的錢将是这样处置：他得总数百分之二十，其余
的就这样分配：四分之一归于我，四分之三归入社会民主党的
基金。当然，这个条件是巴尔烏斯知道的，甚至是他非常高兴
的。在四年中間，这个剧本在德国所有的剧院輪流上演，只在
柏林一个地方就上演了不下五百場，巴尔烏斯收集到的大概
有十万馬克。但是，他不把款項寄去，却寄給知識社的康·
彼·皮亚特尼茨基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老实地通知說：他同
一位小姐到意大利旅行了一趟，把所有这些錢都花光了。因为
这次的确很愉快的旅行，跟我个人有关的只是这笔錢的四分

① 巴尔烏斯(1869—1924)，原为俄国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亡命德国，从上
世紀九十年代起活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
成为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充当德帝国主义的間諜，从事軍火商业。
——譯者注。

② 知識社是高尔基所創办的一个出版社。——譯者注。

之一，所以我認為自己應該向德国党中央提出关于其余的四分之三的問題。我是通过伊·彼·拉施日尼柯夫提出的。但是中央对于巴尔烏斯的旅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我听说巴尔烏斯被撤銷了在党內的某些职位，——說良心話，我倒宁愿人家扯他的耳朵。再后，在巴黎有人指給我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或太太，据说巴尔烏斯就是同她一起旅行的。

“我的宝贝！”我这样想，“宝贝。”

我在柏林看見了一些文学家、美术家、文艺鉴赏家和其他的人們，他們彼此間的區別只是自滿和自我欣賞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美国，我时常看見一心想作紐約的市长或州长的莫里斯·赫尔基特^①，又看見孤独而且疲憊地咒罵一切人和一切事的德布斯^②老头子（他刚刚从牢獄中出来），我看見很多的

① 赫尔基特(1869—1933)，原为律师，美国社会民主党的創立者和領袖，美国右派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分子。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坚决反对苏維埃政权和共产主义。——譯者注。

② 德布斯(1855—1926)，美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因极力反对帝国主义而下獄，一九二一年由于群众的坚决要求，重获自由，但出獄后改变了过去的政治态度。——譯者注。

人和很多的事物，但是沒有遇見一个了解俄国革命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到处我都覺得大家把俄国革命看作“欧洲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和一个国家里的普通現象，在这个国家里，照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漂亮女士”的說法，“通常不是霍乱就是革命”。

到美国去为布尔什維克募集基金的这个想法，是列·波·克拉辛^①提出来的；弗·弗·沃洛夫斯基^②本来要作为秘書和演說会的組織者同我一道去的，他深通英文，但是党給了他另外的什么委任，于是布勒宁（布尔什維克党中央直属的战斗小組組員）就同我一起去了；他是“哑子”，在路上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到了美国还在学。社会革命党人知道我去是为着什么目的，就对这次旅行发生了年青人那样的强烈的兴趣；还在芬兰的时候，查伊科夫斯基就同西特罗夫斯基一起来看我，提議不要为布尔什維克而为“一般革命”募款。我拒絕了为“一

① 克拉辛（1870—1926），老布尔什維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維埃政府重要职务，曾任苏联駐英和駐法大使。——譯者注。

② 沃洛夫斯基（1871—1923），老布尔什維克，杰出的文学批評家和外交家，一九二三年代表苏联出席洛桑會議，被反动派所暗杀。——譯者注。

般革命”募款。于是他們派遣“老祖母”^①到那里去，这样在美国人面前就出现了两批人，各不相干，互不見面，开始募起款来，显然是为着两个不同的革命；至于哪一个更好，更可靠，——美国人当然沒有工夫，也沒有兴致来考量了。看起来他們早就知道“老祖母”了，她的美国朋友們早就为她作了很好的广告，而沙皇的大使却給我安排了一場侮辱。美国的同志們也認為俄国革命是“偶然的和不成功的事情”，所以对于我在各次群众大会上所募集来的款項的处理采取了相当“自由主义”的态度。我总共募集了很少的錢，还不到一万元。我决定在报纸上“賺几文錢”，但是在美国也有巴尔烏斯这样的人。总之，这一次旅行是失敗了，但是我在那里写成了《母亲》，这也是造成这本书里的若干“錯誤”、缺点的原因。

以后我去到意大利，住在喀普里，在那里我埋头翻讀俄国的报纸和書籍，——这也很降低我的情緒。如果一顆从牙床

① 指布里希可-布里希可夫斯卡雅(1844—1934)，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称为“俄国革命的老祖母”。她是社会革命党的建立人之一，属于极右派，主张恐怖政策。一九一七年曾支持克倫斯基政府；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恶毒地誹謗苏联。——譯者注。

上拔掉下来的牙齿能有感觉的话，那它大概会感到自己象我一样孤独。我很惊讶于一些相识者从这个“立场”跳到另一个去的那种小丑似的敏捷和灵巧。

从俄国跑来了一些投机的革命家，他们打了败仗，十分惊惶，咒骂自己和那些把他们拖进“绝望的事业”中去的人们。

“什么都完了，”他们说，“什么都被打垮了，扑灭了，放逐了，丢在监狱里了！”

有很多可笑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愉快的事情。从俄国来的一个客人——一个文学家，而且是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他说我仿佛一向扮演着《在底层》里面的鲁卡这个角色，向青年们讲了一大堆安慰的话，他们相信了我，碰了钉子，而我却一溜烟跑了。另外一个客人硬说我被“倾向”腐蚀了，说我是一个“完蛋了的人”，我否认巴蕾舞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是“皇家的”。总之，有非常之多的可笑的、愚蠢的事情，常常使我觉得从俄国吹来了一种臭极了的沙土。

突然之间，象在童话里似地，我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当然，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啊！

但是我的高兴，只到第一次会议为止，只到争论“议事日

程”这个问题为止。这些争论的猛烈一下子就把我的热情弄得冰冷了，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党内如此尖锐地分裂成了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一点我在一九〇三年就知道了，而是因为改良派对于弗·伊·列宁抱着敌视的态度。这个敌视的态度从他们的演说里泄漏和喷射出来，好象在高压下的水从一条旧的“水龙带”里泄漏和喷射出来一样。

说些什么话，往往并不重要，而重要的，却是怎样地说。格·瓦·普列汉诺夫穿着礼服，扣上所有的钮扣，象一个新教的牧师；他致开会词，说话好象一个传教士，坚信他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每一个字眼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极有价值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们头上的空气里播出圆熟而又漂亮的词句，而当布尔什维克的座位上有人动一动嘴唇，向同志交头接耳的时候，这位尊贵的演说家便悄悄地停顿一下，把自己的眼光象钉子一样向那个人盯去。

礼服上有一个钮扣是普列汉诺夫最喜爱的，他温存而且不断地用手指摩挲它，并且在停顿的时候象按电铃似地按它一下，——可以说，正是这一按才停止一下他的滔滔不绝的演讲。在一次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准备答复什么人，把两手交叉